

# 陈三立与近代江西诗风的演变

赵家晨<sup>\*1</sup>

光绪十六年（1890）陈三立漫游武昌，结识张之洞幕府文人群体，诗风由早岁寓居湖湘时的浪漫绮丽转向严谨涩硬。后来陈三立避居苏沪，研磨诗艺，其宗宋之风得以确立。因祭扫祖塋之故，他每岁必往返苏赣数次，江西籍诗人借此契机多向其求益诗学，其亦乐于大力奖掖后进赣地诗人，掀起清末民初江西诗坛诗学创作新高潮，晚近江西诗坛诗风遂由崇尚汉魏六朝转而推尊杜、韩、苏、黄。陈三立以其不囿唐宋的诗学思想指导后进赣籍诗人，开启了近代江西诗坛新面貌。

【关键词】：陈三立；江西诗坛；诗风；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8）02—0095—07

陈三立作为中国诗坛近百年来最杰出的诗人，其诗虽“参错于杜、梅、黄、陈间”<sup>[1]（P204）</sup>，然其诗“自具一种格法，精健沉深，罢落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sup>[2]（P51）</sup>，苍莽排宕之意态未可列之江西社里，足以自成一家。他以桃唐祢宋、自成一家的诗学思想指导江西籍的诗人自山谷、昌黎入手，学习唐宋名贤之诗法，融会贯通，锻造一家之诗。由此，掀起晚近江西诗坛诗歌创作的新高潮，促使清末民初江西诗坛由模拟汉魏六朝诗转向宋代“江西诗派”的回归。陈三立经过一系列的诗学活动，不仅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诗学宗旨和诗坛地位，且主导了晚近江西诗坛的复兴和诗风的演变。

## 一、漫游武昌与宗宋诗风的确立

陈三立诗“瓣香先辈山谷，为江西派中宗匠”<sup>[3]（P1532）</sup>，在民国时期已为世人所知，陈三立却说：“我四十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sup>[4]（P19）</sup>考察历史文献，可知陈三立说法并不确切，他在青年漫游湖湘之时即已对黄庭坚诗有好感，漫游武昌之际，又与张之洞幕僚梁鼎芬、范当世以及后来沈曾植、郑孝胥的交游密切，宗宋诗风亦是在张之洞幕府镶政时期确立。湖南新政失败后，陈三立潜心研习宋诗，其宗宋诗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避居金陵后更加凸显。

陈三立在漫游湖湘时期已对黄庭坚多有好感，在评点他人诗作时总会以黄山谷诗为比照对象，或直接作诗称赞黄山谷，其对宋诗的态度并不似他中年所说的那般“未尝有一日之雅”。陈三年早年寓居湖湘时为友人诗作评点时常以黄庭坚为参照对象，指明友人诗歌导源于山谷。光绪五年（1879），陈三立评点廖树衡诗说“大诗魂雅之中复有雄直之气行呼其间，大似苏黄”<sup>[3]（P1156）</sup>，直接点明廖诗有苏轼、黄庭坚诗的气度风骨。光绪十五年（1889），陈三立游览黄庭坚故居，作有诗句“千年今怅惘，一代汝精灵”（《长沙还义宁杂诗》），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乡贤黄山谷的敬仰之情。从这两则事例中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陈三立对于黄庭坚怀有敬仰崇拜之情，总是有意提及他，对其诗歌上取得的成就高度认可。

陈三立宗宋诗风是在漫游武昌时期确立的，这一时期他学诗对象从宋人黄庭坚扩大到唐人韩愈，然主要以宋诗为法门。光绪十六年（1890）陈宝箴赴任湖北，陈三立随父入武昌，谋职于两湖书院，多与张之洞督幕文人梁鼎芬、黄遵宪、范当世、范钟、易顺鼎、杨锐雅集和冶游，切磋诗艺，交流作诗心法，诗学旨趣逐渐转向韩昌黎、黄山谷。张氏幕府文人梁鼎芬诗“旨与山谷、后山相近”<sup>[3]（P1521）</sup>，范当世、范钟兄弟亦诗学嗜宋。故在与梁鼎芬及范氏兄弟频频互动中，陈三立诗歌风格也发生变化。其诗有：“世外楼船兼雁眼，梦中江海挟蛟行。寄将哀怨春应觉，激宕平生泪欲横。”（《人日得易仲实镇江舟中寄诗感和二

<sup>1</sup> 赵家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 210097）

首》其一）也有诗云：“黄生娇逸梁髻，各以鼙声助瀑声。梦醒蚊雷挥汗处，依稀今有佛灯明。”（《慈航寺是去岁梁节庵黄仲方易由甫及予同宿处》其二）这些诗句中既有韩诗想象奇特、极度夸赞的特色，又有黄诗法度精严、句式整齐的优点。因此，黄公度评陈三立诗“胸次高旷，意境奇雅，当其佳处，有商榷万古之情，具睥睨一切之概”，言其诗得韩黄真谛，鼓励陈氏“有此才识，再勉励为之”。<sup>[5] (P114)</sup> 总之，畅游武昌的五年里，陈三立得以结识梁鼎芬、黄遵宪、范当世等，后又识得陈衍、郑孝胥等名士，其宗宋诗风在这一阶段已开始显现，且在后来的岁月里愈来愈明显。戊戌变法失败后，陈三立“自是肆力为诗，陶写性情，呼之欲出”<sup>[6] (P161)</sup>，诗风出入唐宋名贤间。后来他避地海上，诗风有杜、梅、黄、陈之长。辛亥以后，陈三立寓居沪宁，其诗融荒寒之景、哀恸之情、勃郁之气于一体，又想象奇绝、善造境炼字，开“生涩奥衍”一派，呈“奥邃苍坚”之态。所谓“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不仅隶于江西社里也”<sup>[3] (P1532)</sup>。陈三立诗风到晚年才得以最终确立，梳理其诗学途径可知其诗经历从模拟汉魏六朝诗转向仿写唐宋杜韩黄陈到写情状物、自成一家。

陈三立诗由模拟前贤到自成一家有其深邃的缘由，这是其复杂的人生际遇以及时代风云共同造就的。畅游督幕时期，他目睹甲午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国事日益艰难，再加上过从之士以及幕主张之洞等对宋诗的积极推崇，故而他选择与早期诗作绝然不同的诗风，走上模拟宋诗，学习黄（庭坚）、陈（师道）诗风的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主持的湘中改革也遭夭折，陈氏父子二人皆被革职永不叙用，未几，父宝箴暴毙西山，仕途中断、家庭遭厄，对正直壮年的陈三立而言是极大的打击，自此寓志于诗，“诗境一变，闵乱伤时，多变雅之作”<sup>[7] (P46)</sup>，家国离乱、离黍之悲寓于诗中。故而，陈三立诗风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呈现出转变的过程也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家学渊源对于陈三立走上学宋诗、熔铸唐宋诗歌于一炉有着直接的关系。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本诗文书俱佳者，诗风“沉郁深挚”，对于同乡黄庭坚以及唐人杜甫的诗推崇备至，范当世称其诗“精辟有法”，盖学此二人诗的结果。诗作《长沙秋兴用杜韵八首》（其一）云：“商飚飒飒动平林，冷入潇湘气郁森。水阔鱼龙争落照，风高鹰隼突层阴。”秋景萧瑟，秋气肃杀，正映衬诗人不屈人格和昂扬的斗志。“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蛭触争雄矜得意，龙蛇起陆恐伤时。”这几句诗又反映出诗人对于时下举行的变革的担忧，对改革前途未卜的愁索。除杜甫外，陈宝箴对山谷诗也极其推重，陈三立曾言其父“嗜山谷诗，尝憾无精刻”<sup>[8] (P1127-1128)</sup>，陈三立为让黄庭坚诗歌广为流传，解资刊书人。陈父对黄诗的喜爱直接影响到陈三立，《销食录》曾载隆观易诗“陈右铭观察亟为欣赏，命伯严公子抄录以为把玩，后集中有《留别右铭伯严》《怀伯严》诸诗，足徵文字因缘而已”<sup>[8] (P190)</sup>。隆氏诗歌得到陈宝箴赞赏，陈氏甚至让儿子陈三立抄录赏玩，而隆诗“逢源杜与韩，语言之妙类大苏，而似归宿于吾乡山谷老人”<sup>[9] (P1869)</sup>，是学习宋人黄庭坚的。陈父让青年陈三立把玩时人学宋诗作，又让他与隆观易交游，无疑在陈三立学诗道路上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因此，不难看出，陈三立之所以能学黄、陈、杜、韩而又能出新求异、自成面貌与其自幼所秉承的家学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陈宝箴的诗学传直接影响陈三立走上学“西江诗派”之路。

诚然，良好的家学传承、渊博的学识是造就优秀诗篇的必然条件，外在的时代风云、个人的身世遭遇对诗歌风格、内容的影响也至关重要。陈三立诗风是随着时代变化以及个人经历而变化的，正是由于他不断吸纳前人诗风、转益多师，调整、裁剪、完善自己诗作，才能“诗宗西江，标举兴象，享甲新意，妙罄言诠，而不堕入南宋刘后村一派”<sup>[10] (P113)</sup>，得以自成一家。

## 二、往来苏赣与宗宋诗风的传播

陈三立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随父暂居南昌西山，即有赣人蔡可权向其请益诗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寓居金陵、沪上，往来苏赣间，赣籍诗人向其请教诗学之风更为炽烈。他通过与赣籍诗人交游、雅集、诗词唱和、评点诗作的方式与他们频频互动，在此温情脉脉的氛围中宗宋诗风得以流播至整个江西诗坛。陈三立以桃唐称宋、自成一家的思想指导赣籍诗人，开启了江西诗坛诗歌创作新局面。

评点赣籍诗人诗作，指明他们诗学渊源和诗歌特色，是宗宋诗风传播的主要方式。陈三立对赣地诗坛后进学黄山谷大加赞赏。“乡里英俊少年六七辈，则类多偏嗜山谷，效其体，殫竭才思，角出新颖。窃退而称异，殆西江派中兴复振之时乎？”<sup>[3] (P1422)</sup>他认为江西诗派可由这些赣籍后进诗人重新振兴，因此对他们多加激励。他评吴天声诗“胜处类窥涪翁蹊径……杜陵

所谓“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者也”<sup>[3] (P1429)</sup>。他俨然已将吴天声视为自己诗学的接班人，对他振兴西江诗派寄予厚望。他说陈病树诗“力追后山……至若今人，虽号杰出者，病树与之俯仰揖让于其间，无所愧也”<sup>[3] (P1476)</sup>。直言陈病树诗作之佳，可跻身当世第一流诗人之列。此类评语尚有许多，他还曾为夏敬观、杨增萃、胡朝梁、程学恂、胡先骕、王易、王浩、龙榆生、黄养和、黄次纯等诗人评诗。他之所以不厌其烦为赣籍诗人评诗、改诗，目的即为推广宗宋诗风，以振兴江西诗坛。

唱和、雅集、冶游也是陈三立传播诗风的有效方式。陈三立在诗坛享有盛名，学诗之人多歆慕从其交游，殆其“流寓金陵，诗名益盛，同辈习闻所说，归礼涪幡，偶事篇章，并邀时誉，而后生未学，远近向风者，更无论矣”<sup>[11] (P300-301)</sup>。从其游者多执弟子礼，对其恭敬有加，散原翁偶作篇章，辄在后进诗人中广为流传。在此种风气下，宗宋诗风迅速在江西诗坛涌起。陈三立诗集中关于与赣籍诗人唱和之作有多首，与夏敬观唱和诗28首、龙榆生唱和诗12首、邵祖平唱和5首。此外，陈三立多次参与江西诗人组织的冶游和雅集活动。民国十一年（1922）春，胡先骕随陈三立、柳翼谋往南京太平门观桃花，赋“清论欣能共诗老，坐看残日下西畴”（《同陈伯严梁慕韩柳翼谋诸前辈太平门外赏荷花》）诗句，表达对散原翁的歆慕之情。民国十八年（1929）秋，龙榆生邀约名流陈三立、朱祖谋、夏敬观等雅集沪上张园，龙氏作诗“义宁诗老伤离甚，每味清言动肺肝”（《己巳重阳前十日约集散原彊村》），对陈三立即将离沪赴匡山伤感不已。再者，赣地诗人多与陈三立有师生之谊，或正式拜师入门，或不断请益诗学。夏敬观诗云：“从翁学诗二十年，初如钝根坐学禅。酒楼一语为道破，立脚不在文字边。”（《寿散原翁七十》）由此诗可知陈三立对其多有点拨、开导。与赣籍诗人往来不绝的诗词唱和，规模盛大次数繁多的雅集燕游，脉络分明的师承关系，这些都使得近代江西诗人诗学皆从散原翁，从山谷、后山入手，诗学渊源上溯宋“江西诗派”。

陈三立是以何种诗学观指导赣地诗人作诗的呢？

首先是桃唐祢宋。陈三立虽主张学诗应以宋人黄庭坚入手，但也主张学习唐人杜甫、韩愈之诗，融唐宋众人之长。他自己诗歌即历经从学韩黄到治杜、韩、黄、陈为一炉的过程。他曾与人论诗言“既乎入唐宋之堂奥”<sup>[3] (P1521)</sup>，将唐人杜甫、韩愈以及宋人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作作为学诗最高典范。他评点后学诗作多讲明他们诗学渊源窥唐浸宋。胡朝梁诗《散原师新居成赋呈一首》云：“吾师散原先生者，古之隐君子非与。桃源岂非世间有，瘦信新成江上君。中有歌声出金石，谁言作江殊渔樵。老怀定爱园蔬味，风雨时时一荷锄。”全无诗歌章法韵律，特意押拗韵，诗作瘦硬生涩、古朴奇崛，散原翁评“突兀，似涪翁效杜”<sup>[3] (P1346)</sup>。吴天声诗《孤愤》云：“回顾苍茫万籁沉，鬼来窥户夜森森。忧时莫著藏兵论，报国常存未死心。聚铁九州成大错，巢林百舌啖冤禽。引刀惻惻悲风动，欲起乖龙作雨霖。”起调即已造境深沉，散原翁评吴诗“风格道上，脱弃凡近，句法时得宋贤黄、陆诸公胜处”<sup>[3] (P1425)</sup>。而赣籍诗人也多遵从陈三立融合唐宋诗为一体的诗学思想，创作的诗歌多出入唐宋时贤之堂奥。陈三立曾言“诗必宗江西，靖节、临川、诚斋、白石皆可学，不必专下涪翁拜也”<sup>[11] (P301)</sup>，虽然说诗学江西，但跨越时代的限制，众体诗歌皆可学。由此可知，不专门宗尚某一时代、某一具体诗人，但凡值得学习的诗歌风格陈三立都鼓励后进诗人学习，但其主要学诗门径还是以宋诗为主，兼采唐人杜韩二家。

其次是自成一家。陈三立曾言作诗要“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sup>[3] (P1512)</sup>，认为学古人诗风不能为其所困，要能打破藩篱，形成自己的诗歌特色。他“力主夏夏独造”<sup>[3] (P1521)</sup>，且将此作为指导后进诗人诗学思想之一。而赣地诗人受这诗学观影响，所作诗歌皆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不为前贤所囿。如胡先骕诗“由苏黄以擅杜韩，而于少陵浸渍尤深云……盖已绝去町畦，自成为步曾之诗，杜韩苏黄筌蹄而已”<sup>[12] (P5)</sup>，其诗“静穆之致，合坡、谷为一手矣”<sup>[7] (P450)</sup>，诗风集王安石、苏东坡、王维、韩愈、黄庭坚诗歌之长，往往驰思域表，弋句象外，冥心独造，眇合自然，形成自身特色。汪辟疆诗“首在寝馈玉溪，以挹其绵远之韵；继在诵读杜、韩，以见其骨律之坚苍、胸怀之超脱；终在细玩荆公、山谷，以求其体势之变化、措语之清拔”<sup>[11] (P797)</sup>，合唐人情韵与宋人意境为一手，最终形成其苍秀明润、用笔开合自如的诗风。不难看出，江西诗人自成一体的诗歌风格都是在借鉴唐、宋名家诗风基础上，糅合自己学识、性情、襟抱、阅历才得以最终定型的。

陈三立指导赣籍诗人作诗门径自宋人黄、陈上溯唐人杜、韩，杂以宛陵、荆公、东坡、诚斋、靖节等，将学诗源头由宋至唐再至六朝，盖这三个时期是古典诗歌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期，这与沈曾植“三关”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沈曾植“三关”说强调学诗如同佛禅修行之过关，“先是学习元祐诗人，臻化后，才能学习元和诗人，再完善后，方可学习元嘉诗人”。<sup>[13] (P44-45)</sup>

在沈曾植看来，元嘉时期诗人以谢、鲍、陶为代表，他们诗作自然天成，乃是诗歌最高境界，也最难达到。他以学人身份论述“三关”说，逆上学诗，主张诗歌要与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之精神，这与陈三立诗歌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陈氏将这一作诗路径传导至后进诗人，倡导诗人在理顺元祐与元和、开元以及元嘉诗歌渊源的基础上学习古人诗法，铸造出反映时代特质、融入个性特征的自成一家之诗歌。陈三立以学人冷峻之思、诗人狂热之情、文坛领袖之名不断提携、奖掖赣籍后进诗人，掀起晚近江西诗坛诗歌创作的新高潮。

### 三、陈三立与晚近江西诗坛复苏及诗风的演变

古之江西多产文人雅士，赵宋王朝三百年诗家众多，北宋后期黄庭坚开“江西诗派”之先河，南宋至元以来，江西诗坛多沿袭“江西诗风”。然“入国朝，最以诗名显者，有蒋心余、吴雪兰，复有高陶堂，皆于西江派不相入也”<sup>[3] (P1422)</sup>，有清一代江西籍诗人多不学宋诗，诗歌或学汉魏六朝，或模拟唐宋，或趋附同时期全国诗坛主流。在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江西诗坛以黄爵滋、高心夔为代表，主张经世致用，诗学汉魏诗风，古朴质实，且“力亦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sup>[1] (P578)</sup>，在全国影响甚微。然至光绪、宣统、民国时期，江西诗坛诗家叠出，同光体宗宋诗风流播海内。此种盛况的产生原因虽然复杂，但陈三立频繁往来苏赣，肆力指导江西籍诗人潜心为诗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陈三立培育了数个以赣籍诗人为主体的次级诗人群体，这些诗人群体对陈三立诗风的推衍起了重要作用。庚子年（1900）后，陈三立携家迁居金陵，因祭扫祖墓又多往来于苏赣之间，但凡陈三立长期寓居之处，多半形成崇尚其诗风的诗人群体。他曾长期居住在南京青溪，赣籍诗人胡先骕、汪辟疆、邵祖平、王易等从其游，诗风多效其体。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京东南大学胡先骕、邵祖平等创办《学衡》杂志，内设“文苑”一栏，多刊登江西籍或带有江西诗风的他籍诗人之作，逐渐形成以胡先骕、王易为核心，邵祖平、王浩、汪辟疆、陈衡恪、蔡可权等为羽翼的赣籍诗人团体。1929年冬，陈三立隐居匡庐，庐山遂成为江西诗人活动的大本营，陈三立自然成为这个阵营的灵魂人物。长期从散原游或向其讨教诗学的赣籍诗人有程学恂、吴宗慈、吴天声、陈隆恪、陈瀛一等，他们或游匡庐秀景，或筵饮雅集，流觞曲水、饮酒赋诗，逐渐形成庐山诗人群体。在庐山诗学活动最为盛大的当属癸酉（1933）庐山风松林雅集，此次雅集囊括程天放、程学恂、吴宗慈、龙榆生、吴天声、陈瀛一、程臻等八十七人，“庐山游客唱酬之盛，盖旷千岁始获擅兹一时也”<sup>[3] (P1149)</sup>。这些诗人在后来抗战时期，为宗宋诗风流播打下坚实基础。省外赣籍及江西本土诗人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或从散原翁游，或与其诗词唱和，或请其评点诗作，他们对散原翁钦佩敬慕真挚之情，促使他们诗歌风格多受陈三立及宋诗的影响。

宗宋诗风并未随着陈三立的离世而消亡，在江西本土赣南地域随着早年诗学受业于散原翁诗人到来，崇黄尊杜的诗风也在赣南风行一时。抗战时期，随着中正大学在赣南杏岭的成立以及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迁至泰和办公，高校教授与省府职员爱好旧体诗词者甚众，纷纷成立多个诗学团体，赣南一时成为江西诗坛创作的重心。在中正大学，文史系主任王易于1940年创办《文史季刊》杂志，多刊载校内教授旧体诗词，胡先骕、王易、程学恂、欧阳祖经、吴天声、萧宗训、胡献雅、陈颖昆，另有他籍学人胡光炜、王英瑜等诗作常见此刊。在旧省府内，成立了省府职员为主体的“澄江诗社”，他们创办《江西文物》月刊，中辟“赣风录”专栏，以诗作为主，来稿以赣籍诗人为主，经常发表作品的有程学恂、吴宗慈、辛际周、胡先骕、吴天声、叶纫芳、胡献雅、彭程万、蔡敬襄、杨庚笙、卢兆梅、谌福谦等。在抗战时期，流寓赣南的江西诗人们诗作多沉郁低沉，既有杜陵“诗史”之志，又有韩诗“奇绝”之象，句法、炼字从黄山谷诗中出。因此，宗宋尚唐诗风在赣南成燎原之势。随着抗战胜利，省府及中正大学回迁南昌，程学恂、王易、吴天声、涂世恩等20多人又在南昌成立“宛社”，多于百花洲襍集，评定诗作名次，以诗钟为戏。自然，延续的依旧是黄、韩诗风。

诗学的代际传承使宗宋诗风生生不息，门生对诗学的传导，是陈三立在江西诗坛持续影响的另一途径。王易、胡雪抱、汪辟疆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王易门下有诗弟子涂世恩，自言“及事简庵（王易），导以李杜苏黄之途，旁及后山、简斋二家”（《与杆庵论诗书》），其诗扶奇奥，穷变态，千汇万状，气力遒劲，举重若轻。胡雪抱受宋诗影响，力避唐诗之肤廓，宋诗之拗涩，为同光体赣派外围成员。其诗气骨高奇，渊懿郁勃，门下弟子有二：黄养和、黄次纯，为都昌黄锡朋之子。此二人在陈三立寓居庐山期间（1929—1933）多向其请益诗学。陈氏评黄养和诗“构思沉挚，缀语峭洁，盖能脱凡近而渐进于古之作者

矣”<sup>[3] (P1437)</sup>，评黄次纯诗“气清格逸”<sup>[3] (P1500)</sup>，盖二人皆能学散原诗之真谛，对其句法、格调认真领悟后而成之。至于汪辟疆，在南昌、江宁皆从陈三立学诗，其诗远受韩昌黎、黄山谷、陈后山等人影响，近受散原翁影响，诗风苍秀明润。其门下有二弟子陇人霍松林、湘人程千帆，诗作皆能入唐宋之堂奥，“程诗措语拗峭、炼字奇警，霍诗豪纵畅快似唐音，用意曲折幽深似宋调”<sup>[14] (P174)</sup>。由此可知，师门传授不仅使得陈三立宗宋诗风在江西本土流行，更使得同光体诗风跨越地域限制，流播海内。

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江西诗坛多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诗作学汉魏六朝，诗风多古朴，这一时期江西诗坛以黄爵滋和高心夔为代表。道光年间江西诗坛形成以黄爵滋为首，郭仪霄、艾畅、符兆纶、徐东松等为羽翼的江西诗人群体，他们“共同的诗学宗旨是复汉魏唐宋之古，特别是尊杜少陵韩昌黎，求真气，重骨力，学古而创新，注重以学力、阅历、道理、性情充实诗创作”<sup>[15] (P250)</sup>。此时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民间百业凋敝，因而他们诗作多慷慨激楚之音，属变风变雅之列。黄爵滋诗“渊源汉魏，兼采唐宋，有雄直高旷之气，特别是古风，纵横踔厉，如虎啸深谷，响撼云霄”<sup>[15] (P253)</sup>。稍后的高心夔与湖湘王闾运交好，王闾运说“高伯足诗少拟陆（机）谢（灵运），长句在王（维）杜（甫）之间”<sup>[16] (P2159)</sup>。其诗多从“选体”入，五古拟汉魏古诗，七古学杜，熔冶陶、谢、颜、鲍，旁取韩、孟。因此，这一时期的江西诗坛诗歌并不宗宋黄、陈。

江西诗坛何以自清中叶唐宋兼采及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模拟汉魏六朝，转而清末民初推崇宋诗？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时代的变化以及诗人内心情志的转移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乾嘉时期，清王朝还处在盛世的余晖中，社会整体呈现安定繁荣之况，学界汉宋朴学方兴未艾，文坛整体创作倾向是歌咏升平，唐诗豪逸情怀与宋诗严谨法度成为诗人们吐露心声的首选。道光、咸丰年间，外夷入侵、太平之乱，国家政局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家国之思、离黍之叹成为此时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汉魏六朝质朴苍凉的诗风重新为诗坛所接受。及至晚清，国家局势进一步衰微，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诗人在创作中重新找寻宋诗的理智、情思，诗人们借宋诗的句法、炼字一吐内心沉郁、愤懑、哀恸，他们在书写史志的同时又借助唐人杜诗的笔法、韩诗的意境，故而创造出独特的同光体诗风。晚近江西诗坛虽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多兼采唐宋，效法黄、陈、杜、韩、王、梅等，但主要以宋诗为门径。

## 四、结语

陈三立往来苏赣间，极力倡导宋诗，对近代诗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汉魏六朝派一统诗坛的局面被打破，同光体诗派崛起，成为近现代诗坛诗家最多、流传最长、影响最广的诗派。胡迎建云，“同光体的兴起，与社会亟变、人心思变、思潮竞起的晚清世运相关”<sup>[14] (P17)</sup>，面对晚清进一步衰颓的国势，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宝琛、沈曾植、袁昶等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企图挽救危亡。当变法失败后他们面对风雨飘摇的满清政权以及传统文化岌岌可危的正统地位，诗人内心蒙上阴影，不得已借助效仿与晚清时局类似的宋人诗作以吐露内心的抑郁、愤懑。此外，道光、咸丰之际的宋诗运动给同光体诗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效仿的蓝本，他们对宋诗运动干将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曾国藩等人诗作多有模拟，并在前辈诗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师法对象、创作新诗境。晚清以来汉学、宋学调和之风兴起，经世致用思想重新被世人采用，诗人们将这种思想融入诗作促使他们选择更为理性、冷峻的宋诗为学习对象。总之，诗人们基于共同的时代风云以及相类似的身世经历选择了宋诗为精神寄托，他们以宋诗为法门并上溯汉、魏、唐，形成诗风独特的同光体诗派。

同光体诗派肇端于光绪年间，而光大于光绪、宣统、民国之际。早在张之洞幕府之时，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政事之余多座谈论诗，逐渐确立同光体诗派的宗旨和诗风。光宣年间，陈衍、陈宝琛、郑孝胥等都下雅集，团结了黄濬、梁鸿志、林庚白、罗惇融、曾习经等后辈诗人。与北京相对，陈三立金陵唱和亦吸引了胡先骕、程学恂、汪辟疆、余明震、江瀚等人。进入民国后，陈衍在《庸言》《东方杂志》等刊物连载《石遗室诗话》标榜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人诗作，正式确立同光体的诗学思想。与此同时沪上超社、逸社的形成，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陈衍等一大批宗宋诗人的诗名大振，遂吸引了民国大批的青年才俊追随他们学诗，逐渐形成同光体赣、闽、浙三派，诗学活动延绵数十载，成为近代诗坛奇葩。

陈三立在青年时代即对千年前的同邑诗人黄庭坚赞赏不已，其山谷情结也在游历武昌的五年内被点燃，诗学趣旨也从酷嗜六朝转移到偏好西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两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促使陈三立诗歌风格也发生转变，从之前单纯学宋人山谷、

---

后山扩大到学唐人少陵、昌黎，最终练就自成一家的诗风。陈三立往来苏赣间近三十年，其所推崇的宗宋诗风借助各种形式广为传衍。他不仅带动晚近江西诗坛的复苏，也促使江西诗坛从唐宋兼采、崇尚汉魏南朝诗风转变为推尊黄陈、兼采杜韩并以宋诗为主要取法对象，更开创同光体诗派，将宗宋诗风流播海内外。至于同光体诗派笼罩诗坛长达五十余年，后进诗人宗宋诗而不肖，成为晚近诗坛之流毒，亦是后话。

#### 参考文献:

- [1] 陈衍. 石遗室诗话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2] 李渔叔. 鱼千里斋随笔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1.
- [3] 陈三立. 散原精舍诗文集 (增订本) (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4] 张剑慧. 辰字说林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 [5] 陈正宏. 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 [J]. 文学遗产, 2007, (2).
- [6]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7] 王逸塘. 今传是楼诗话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1.
- [8] 钱钟书. 容安馆札记 (第1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9] 陈宝箴集 (下) [M]. 汪叔子, 张求会,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0] 李详. 药里慵谈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11] 汪辟疆. 汪辟疆文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12] 胡先骕. 胡先骕诗文集 (上)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3.
- [13] 马卫中. 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 [14] 胡迎建. 同光体诗派研究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3.
- [15] 胡迎建. 论道光年间的江西诗人群体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 (5).
- [16] 王闾运. 湘绮楼诗文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